

崩人快语



〔意〕多梅尼科·斯塔诺内著 陈英译  
《鞋带》  
上海译文出版社

把两根鞋带绑在一起

□ 蒯乐昊

很少有小说以一封接连一封指责出轨的书信开头，意大利作家多梅尼科·斯塔诺内就在他的小说《鞋带》里这样干了。九封书信，被抛弃的妻子写给她那个负心的丈夫。信写得克制，虽然免不了怨怒和疯狂，但并不怒气冲冲，没有谩骂，没有痛斥小三，甚至没有口出恶言，书写者始终试着不失掉尊严，这样的信，看得出来来自一个受过良好教育、亦有自省意识的女性。

“尊敬的先生，如果你忘了，那也没关系，我可以提醒你：我是你的妻子。我知道你以前欣然接受这个事实，而现在你忽然排斥我。我知道你假装我不存在，假装我从来没有存在过……我知道，要让生活井然有序，你会在晚饭时间回家，和我一起睡觉，而不是想和谁睡就和谁睡。”

小说的第一部，在抛出九封书信之后就戛然而止了。紧接着的第二部另起炉灶，写一对貌似和谐稳定的暮年夫妻，阿尔多和妮姐，从海边度假回家，发现家里闯入过窃贼，所有东西都被翻了个底朝天，许多珍贵之物被砸碎，甚至连他们的爱猫都不见了。他们报了警，警察也毫无头绪。生活还是得继续，他们首先得彻底整理家中，找出到底丢了什么。

老年人的家庭是由回忆组成的，在清理的过程中，一件件残破的旧物揭开了尘封往事。丈夫越来越慌张，他找到了妻子写给他的一封信，往事历历在目。他想起自己深藏密敛在书架顶上的东西，他曾经出轨过一个年轻姑娘，情最浓时，他留下了她的裸照。在回归家庭以后也舍不得丢弃，藏在书架顶的方格里。他马上去检视，果然，那些裸照已经不翼而飞。

小偷究竟是谁呢？家中值钱之物并没有丢失，窃贼似乎洞察了那个唯有他才知道的密罐，他们直奔向那里，夺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秘密，然后砸碎他的生活，留下一地狼藉，作为对他的嘲弄。

多梅尼科·斯塔诺内是意大利作家、编剧和记者，曾以小说《格米托街》获得意大利文学的最高奖项特雷加奖。《鞋带》是他的晚年作品，出版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他已经年过七十。

关于多梅尼科，有一个甚嚣尘上的传闻，猜他就是那个全球大热的匿名女作家、《我的天才女友》作者费兰特的丈夫。意大利文坛不鼓励这种猜测，费兰特在2016年入选《时代周刊》“世界100个最具影响力人物”榜单。同年10月，意大利一位名叫Claudio Gatti的记者在《纽约书评》上撰文，宣称他发现了费兰特的真实身份，他从线人那里获得了“那不勒斯系列”的出版方汇款记录，有一位作者的收入获得了戏剧性暴涨，暴涨时间线跟小说的蹿红同步。

人们对费兰特的真身抱有好奇，但这次记者的揭秘却并不招人待见。费兰特的出版人桑德罗·费里说，他对Claudio Gatti的行为感到震惊：为什么一定要去打搅一个只想好好写书、不想出风头的女作家？“去一个决心避开公众的作家钱包里翻来翻去，我认为这种做新闻的方法是可耻的。”在《纽约书评》刊发了报道之后，所有媒体都在批判这种行为。

撇开这些八卦不谈，无论多梅尼科是不是费兰特的丈夫，他的这本《鞋带》都可以作为费兰特“那不勒斯四部曲”的对偶读物来读，当一个女作家事无巨细地写出婚姻中那些背叛、撕裂和妥协，男作家以他们的视角写出了另一个版本。

结构精巧的小说翻转到第三部，切换为两个孩子的视角。阿尔多和妮姐离婚的时候已有一儿一女，他们目睹了父母互相伤害直至家庭分崩离析的全过程。爱情的受害者从来不止亲密关系中的两角，或是三角，有时候它会一切人裹挟进来。儿女此刻已经成年，儿子桑德罗像父亲一样处处留情，女儿安娜则变成了女权主义者。他们回忆起痛苦的、小心翼翼的童年，父亲按照法定探视时间接他们出去吃饭，教他们如何系紧鞋带。家庭就是绑在一起，不被爱、不快乐，也不得不绑在一起。

复仇的时刻来临了，他们知道父母正在外出度假，他们也知道父亲的秘密藏在哪儿。

为什么呢？带着一种迟来的、残忍的快感，长大成人的孩子们笑嘻嘻地，联手摧毁了那个貌似可以弥合裂痕的家庭。



〔法〕菲利普·索莱尔斯著 陈慧敏译  
《情色之花》  
南京大学出版社

玫瑰不问为什么

□ 育邦

菲利普·索莱尔斯是当今法国文坛上最负盛名、最具创造力的作家之一，他与勒·克莱齐奥、莫迪亚诺共同被誉为20世纪下半叶以来“法兰西文学三星”。

1958年，22岁的索莱尔斯出版长篇小说《奇怪的孤独》，崭露头角，以纯古典的完美风格获得当时的大作家弗朗索瓦·莫里亚克和阿拉贡的赏识。1960年，他创办了《原样》杂志，并逐渐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“原样派”，把诗歌与小说有效地融合在一起，反对改革世界、人生和人类本身，要求一起都应该原封不动，通过文学抵达世界，即获得“原样”世界。他主张作家就是要摆脱一切传统创作方法的桎梏，写出符合当代世界的小说来。

1970年，索莱尔斯在《原样》杂志上发表了翻译的毛泽东诗词十首。

1983年，索莱尔斯出版了《女人们》，引起轰动，成为一部奇特的畅销书。这是一本怎样的书呢？一部既有趣又不容易阅读的书。主人公“我”正致力创作一部叫《女人们》的书，以表现“我”的所见、所闻，书中包含“我”与女性的交往、对女性的见解、与女性的性关系、对女性的感受与体验……在阅读过程中，你不止一次想放弃，即使你耐着性子读下去，最后仍未读完。你读得越多，你就会获得越来越多的信息，会有越来越多的启示光顾你，意味也就越来越深长，你对于世界的印象正朝着几何级增长……所有这些构成了一个立体的、多层次的世界图景。有评论认为索莱尔斯“在自我的迂回处，涌现出多重的个体性和多样性”。《女人们》是一座正在膨胀正在生长的星际云团。作者宣称“世界是女人们的，男人们只是一堆渣滓，冒牌货”，西方的索莱尔斯与东方的曹雪芹真可谓“英雄所见略同”！

因为政治观点经常变化、写作方式不停调整，索莱尔斯在法国也常常遭遇嘲讽和谴责。法国《读书》杂志曾有这样一段话说到索莱尔斯：“在一些人面前显得才智过人，在另一些人面前像个十足的大傻瓜。狡猾！太狡猾了！这就是索莱尔斯其人？”

有一个夏天，索莱尔斯来到了位于大西洋沿岸的雷岛，并在那里开始了关于花的思考。雷岛留下他阅读、写作、散步、畅谈的足印，他说希望自己死后能埋葬在雷岛。于是产生了这本《情色之花》，它像一束来自山中的兰花，清雅迷人。

法国女作家科莱特，一朵健康绽放的女人花，花朵的通灵者，曾写下《花事》，堪称写花的经典之作。《情色之花》并不是要走科莱特的老路，而是被索莱尔斯深深地烙上他独特的印记。

在《情色之花》中，索莱尔斯沉浸在文学和艺术的花朵中，他写龙萨的玫瑰，普鲁斯特的卡特莱兰，海亚姆的郁金香，波德莱尔的恶之花，莫奈的睡莲，马奈的紫罗兰……绽放在文学和艺术记忆之中的花朵，它们迷离美丽，永不凋谢。

在古老悠远的西里西亚（中欧的一个历史地域名称），诗人安杰勒斯说：

你用外部的眼睛看到的玫瑰  
这朵玫瑰恒久以来便开在上帝的肩上  
最为著名的诗句几乎来自天外，远方带给诗人以异禀：  
玫瑰不问为什么，开花因为开花  
不去注意自己，不被人看见

这就是花朵的沉默——玫瑰不问为什么，因而索莱尔斯体悟到：正因其沉默，花朵才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和谈论，也许正因如此，文学和艺术才拥有一个永不厌倦的主题。

在书中，索莱尔斯写到了中国，他说：“不知道怎样，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变成了一个中国人。花园里那只白色的蝴蝶叫作庄，而我叫作子，我们合起来叫作庄子。”我想给予索莱尔斯小小的修正，如果写成“而我叫作周，我们合起来叫作庄子周”，也许更好。他敏锐地写道：“同一个艺术家，穿越几个世纪，随着残荷、幽兰、幼竹等等变化，在每一次内在的灵感的气息中站起身来。”他引用了李白、杜甫、隋炀帝、李煜以及八大山人的诗句，展开关于艺术的喃喃私语。

在写《普鲁斯特》一节时，索莱尔斯向我们宣示，普鲁斯特把花朵与情色联系在一起，在《追忆似水年华》中，斯万与奥黛特用“做卡特莱兰”来暗指“做爱”。花朵成为文学情色事件中必不可少的主角，在隐晦处吐露幽香。这也许正是该书命名为《情色之花》的理由吧！

隐 匿 之 光



〔法〕米兰·昆德拉著 陈慧敏译  
《小说的艺术》  
上海译文出版社

小说家和他的主人公

□ 张怡微

捷克作家米兰·昆德拉是世界上读者最多的作家之一。米兰·昆德拉，著有16部作品，创作于1984年的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就是他最著名的代表作之一，曾被评为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之一。这部看起来是爱情故事的小说，其实创作于昆德拉文学生涯的中后期，那时他已经经历非常多的事。

我们后来知道昆德拉作为作家的身份是神秘的。长达20多年时间，他不愿参加学术活动和任何公众聚会，拒绝在任何电视节目中露面，不让人拍照，千方百计地藏匿自己的私生活。这种毫无商量余地的隐身，令他在被广泛误读中保存了真正的睿智。

他赞同福楼拜的观点：“小说家是努力消失在自己作品之后的人。”在《小说的艺术》中，昆德拉写道：“小说家一旦扮演公共人物的角色，便把自己的作品置于危险之中。他们的作品有可能被看作仅仅是他的动作、声明、立场的一个附庸。”正因如此，重读昆德拉是一个有趣的历程。尽管他本人十分抗拒，仍有一些作品着力还原他复杂的人生经历。他不愿现身面对，到了极端的程度，并不是没有道理。

1929年，米兰·昆德拉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尔诺，那是捷克的第二大城市，布尔诺具有国际氛围，许多当地人会说德语，距离维也纳一百三十五公里。维也纳是艺术圣地，孕育了许多著名的艺术家。这个国家多民族杂居、多语言共处，昆德拉认为这里是中欧的缩影，“最大的多样性存在于最小的空间里”，宛如某种微缩体验。换句话说，昆德拉出生在一个具有艺术氛围的是非之地。这对他人格和世界观塑造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少年昆德拉先是以作曲者的身份踏入人生旅程。他的父亲是作曲家莱奥什·雅纳切克的学生。少年的昆德拉的音乐老师帕维尔·哈斯，是雅纳切克大师最有才华的学生，一个犹太人。昆德拉在1933年后一直追随他学习音乐。

昆德拉的父亲曾经指望他成为音乐家，但昆德拉在成年之后选择了文学。1947年，昆德拉发表了第一篇作品，纪念帕维尔·哈斯。这位他最亲爱的音乐作曲老师于1944年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。很多人不知道，在薇拉以前，昆德拉还与这位老师的女儿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。这是战争最初留给昆德拉个体人生的遗产。

1950年代初，昆德拉开始在布拉格著名的电影学院教授世界文学史，后来也教授小说理论，还指导了一个剧本研讨班。

1967年，昆德拉参加了第四届捷克作家大会，还作了发言，因为这个发言，一位事后被波及的捷克知识分子把昆德拉《玩笑》的手稿交给了阿拉贡，得到了他的帮助，《玩笑》一字不动出版，且经由社会运动的影响获得畅销。然而在1968年，巴黎的出版社正在为出版《玩笑》法文译本做准备的时候，苏联坦克开进了捷克首都。

读过《玩笑》的人都知道，小说人物的命运和昆德拉人生的重要转折有关。昆德拉面临被解聘、妻子失业，父亲也病逝了，生活一度变得很困难，昆德拉那时候用笔名给一个青年世界流行杂志写星相学专栏，还为每一个星相、每一个上升星座配诗。我们在昆德拉的后期作品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中托马斯的失业遭遇中，也可以看到这段经历的幽灵。

1975年，昆德拉终于定居法国，开始在雷恩二大授课，后来他又去了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上课。他还有一些艺术家学生，比如指导了《火线》《纸牌屋》的导演。

1984年之后，因为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大获成功，他开始回避公众。经历过纳粹入侵、冷战和铁幕，跨越了两个世纪和众多边境线，伴随着欧洲幻象的缓慢解体。2019年昆德拉被恢复捷克国籍，一切都过去之后，他给自己的私生活贴上了封条。

对比《玩笑》和《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》，我们能很清晰地捕捉到作家自年轻时敏锐的感知，到历经千帆后借由“爱情”这个容器讨论个体与宿命的悲剧。我们甚至可以想象为什么小说里会出现一个像“江流儿”一样的形象，和主人公一起经历摩西和俄狄浦斯的命运。当然，出于私心，昆德拉漫长而曲折的文学教学生涯也会引起我的兴趣。

微言大义